

三曹与中国诗史

孙明君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首先从宏观角度探析三曹与中国诗史之深层关系;继而采用散点透视法分别就三曹与中国诗史之若干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最后较为细致地阐述了前文涉及而不便展开论述的三个诗歌史与思想史问题。全书旨在从中国诗史的流变中把握建安时代三曹诗歌的艺术精神、创作体制、创作方法的继承性与革新性,进而对三曹及建安诗歌在诗史上的位置进行新的界定。文章认为中国诗史系统呈现出“三源一流”的嬗变大势,三曹恰恰处于三源合一流之关捩期,他们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中国诗史的新路向。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曹与中国诗史 / 孙明君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6

ISBN 7-302-03572-5

. 三... . 孙... . 诗歌史-文学研究-中国 . I207.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4420 号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校内,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文学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1168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37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 第 1 版 1999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3572-5/I · 24

印 数: 0001 ~ 2000

定 价: 19.50 元

序

葛晓音

50年代以来,建安文学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这自然是因为17年间衡量文学价值的几把尺子如“人民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都适用于建安文学的缘故。既然是重点,评价也就定型。以至于进入80年代前期,人们对于建安文学的认识仍不免受17年观点的拘束,至80年代后期,才受当时思潮的影响,逐渐解放。这一变化,明君在绪论中用“现实说”和“觉醒说”加以概括,是很简明切当的。其实又何止于建安文学,整个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趋势莫不如此。

文学研究既是学术,总不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而中国学界与文化界一样,又是很容易形成潮流的。有了潮流,便有了赶潮流的人群。能冷静观看潮流的人倒反而显得落寞寡合。但这样的人却往往能自立其说,另开境界。明君在理智地分析了“现实说”和“觉醒说”的长处和不足以后,榷其中论,力求客观地对建安文学的全貌和本质做出准确的分析,这既要有学者独到的见识,也要有敦诚君子的品格。

明君的《三曹与中国诗史》是在系统地研究了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时期所有关于建安文学的论著之后写成的。至少在我所见

的有关这段文学史的论著中,还从未有人如此认真地分析过前辈时贤的得失,并把各种论点归纳总结,使自己的论述建立在充分掌握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是这本书的绪论和附录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使人一编在手,便对40多年来建安文学研究的概况一目了然;其次是中间三大篇的各个专题都能在广泛征引和检讨已有论点的同时突显出自己的见解。通过析论和驳论展开自己的论述,并精确地引出他人论点的出处,这本来是学者应当遵守的规范,也是起码的道德。然而近些年来,能够恪守学术规范的人不多了;而不客气地照搬并“铸”他人成果的煌煌巨著却日见增加。对照之下,明君的诚实,尤其难能可贵。本书的构架也正是出自这种老实的态度,“不求面面俱到,只选择了若干自己有感想、有新见的问题分别展开论述。这样,本书合之虽为专著,分之则为论文集”;“每一章即为一篇首尾完整的独立论文”(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绪论)。这种写作形式不能像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新编文学史和诗史那样,大块地“包容”他人成果,必须实实在在地说出自己的见解。虽然文字不多,部头不大。但两相比较,价值孰高孰低,明眼人一望便知。

明君在考察了建安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之后,选择“三曹与中国诗史”这一题目,“旨在从中国诗史的流变中把握建安时代三曹诗歌的艺术精神、创作体制、创作方法的继承性与革新性,进而对三曹及建安诗歌在诗史上的位置进行新的界定”(同上)。这一角度的选择是对建安文学研究现状的突破,也有相当大的难度。目前已有的建安文学专著一般都是按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法,分时代背景、作家思想、诗、赋、文、文学理论几个部分梳理归纳。这种框架并非不能出新,但缺乏一种宏观把握的魄力,不易更新视角,使研究向纵深发展。本书内篇三章,提出中国诗史三源一流说。认为三曹恰处于三源一流的关捩期,并以此确定他们在题材、气象、诗体、人格等方面开辟中国诗史之流的贡献。外篇六章主要分为曹操对原

始儒学的诗化、曹丕诗歌中的生命意识、曹植诗歌中的人格建构三方面,也都是抓住三曹对中国诗史最重要的影响立论。这样,虽然各章独自成篇,却又自有内在联系,使外篇与内篇形成分论与总论的关系,较完整地体现了全书的基本构想,这可以说是本书的另一特色。

当然,判断一本专著学术价值的高低,最基本的标准还是看它解决问题的多少,有无作者的独见和创获。古典文学研究与美学、文艺理论等学科的不同,在于理论研究者可以用史学研究的成果构筑资料基础,以第二手乃至第三手资料为论据,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文学史研究应当是以原始资料为论证依据,切实地解决一些史学上的问题。但凡以同行研究成果为资料依据、构筑理论框架的论著,不是失于架空,便是缺乏新意,原因就在于这种宏观概括如果没有自己独到的微观研究作基础,往往从论点到论据都是一些已知的常识或他人的成说。因而文学史研究必须求实,切忌虚浮。本书的主要长处是能够以实证为依据,对建安文学研究中许多流行的概念和观点进行追根溯源的清理和辨析,进而对这些概念和观点是否适用于评价建安文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内篇第一章在梳理了先秦两汉的“诗言志”说之后,指出真正将原始儒学“诗言志”的理想落实到创作中的是曹操。第三章详细考察了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的由来,指出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最早提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并谨慎地分析了鲁迅征引铃木之说的本意,以及这种观点在学界流行的情况。继而又在检讨“觉醒说”的各种观点之后,提出建安时代“人的觉醒”包含政治思想层和生活方式层两个层面;“文的自觉”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而不表现为与儒家传统文学观念决裂。外篇第四章不赞成以往认为曹操逆违儒家思想的一般看法,通过分析汉末形势及曹操的政治策略、法治思想和原始儒学的人才观,有力地论证了曹操的主导思想表现为向原始儒学人文精神回归的观点。第七章据《艺文类聚》卷56所录《典

论·论文》、王粲归附曹魏的时间、阮瑀的卒年等史料,论证此文作于建安16年,推翻了流行的“黄初初年”说和“太子时期”说。又通过对《典论·论文》内容的全面分析,指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均为先秦两汉儒家成说,不是“文的自觉”的号角。文章只是为改变文人相轻的陋习,劝告文人安心于翰墨工作。作者的见解或者可容商榷,但其论证则都基于实事求是的考订,不仅仅是为成说翻案。此外,第八章分析曹植的人格特征的前后变化,将关于曹植行为的史籍记载、曹植在诗文中的自我表白联系起来,探索其建立儒道互补的人格结构的意义;第九章对汉儒“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予以辨析,中肯地分析了这种理论被汉儒歪曲的原因,指出诗史上“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情感特征由曹植首次在创作上完成;也都颇有新意。“温柔敦厚说”在古代被抬高,在当代被贬斥,向来缺少公允的评价。这里的分析体现了辩证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贯串于全书,也是作者多有创获的重要原因。

明君多年来师从霍松林先生。1993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随陈贻炘先生继续研究,成为北大中文系第一位博士后。其为人忠厚谦和,文风也老实严谨。常言道“文如其人”,虽不尽然,对于明君却是适用的。做学问最要紧的是老老实实、谦虚谨慎的态度。明君以此见长,又能勤奋耕耘,必然会有丰厚扎实的收获。他在博士论文《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出版之后不到四年,又有这部新著问世,便是学业有成的明证。今明君嘱我作序,遂拉杂写下这些感想,希望与明君共勉,也藉此表示祝贺之意。

1998年7月于日本东京大学

绪 论

一、新时期建安文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建安文学,千载而下,令文人骚客欣赏不已。他们或考订、或整理、或写序题词、或阐释微言大义,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珍贵遗产。1949年以来大陆学者沿着刘师培、鲁迅等先生所开创的新路向对建安文学进行了深入探索。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方法的优化,建安文学研究呈现出新气象。其主要表现是:(一)在诗文整理方面出现了一批质量上乘的校注本,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文本。如夏传才先生的《曹操集注》,夏传才、唐绍忠先生的《曹丕集校注》,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郁贤浩、张采民先生的《建安七子诗笺注》等。另外,张可礼先生的《三曹年谱》和河北师院中文系编辑的《三曹资料汇编》的问世,为我们了解三曹生平事迹与创作背景、检索古人研究状况提供了莫大方便;(二)发表了许多研究专著和论文。除张可礼的《建安文学论稿》、王巍先生的《建安文学概论》、钟优民先生的《曹植新探》等专著之外,许多分体断代文学史著作,都对建安文学做了析论,如葛晓音先生的《八代诗史》、王钟陵先生的《中国中古诗歌史》、钱志熙先生的《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程章灿先生的《魏晋南北朝赋史》等。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建安文学研究论文数量犹丰,其中既有造诣精深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亦有意气奋发、思想敏锐的中青年学人;(三)新时期以来已召开了四次规模较大的建安文学研讨会:1983年5月在安徽亳州、1988年11月在河南

许昌、1991年4月在河北邯郸分别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1993年5月在安徽亳州召开了全国首届三曹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的召开推进了建安文学研究的进程,提高了建安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显然,进入新时期以来,建安文学研究走上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轨道,取得了巨大成就。

新时期建安文学研究或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关于建安文学总体特征的研究;一是关于建安文学成因的研究;一是关于三曹的研究;一是关于建安七子与其他诗人的研究;一是关于建安文人集团的研究。以下就此5个方面的研究现状作一粗线条的勾勒与简要的评说。

如何从整体上把握建安文学的整体风貌,是研究者首先触及的问题之一。在1949年至1966年17年间,多数学者将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等同于“建安风骨”,并对“建安风骨”这一古典文艺理论范畴赋予了新的解释。流行的观点是,所谓“建安风骨”即是指建安诗人在他们的创作中一方面反映汉末社会的动荡和民生疾苦,一方面表现他们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时代特征。此论抓住了建安文学的主要特征,同时却忽略和回避了建安诗作中那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内容。

进入新时期后,这种观点受到了质疑。表现之一是对“建安风骨”的理解提出了新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不是对建安文学总体特征的概括,不是指充实刚健积极向上的思想内容,不能包容建安文学多姿多彩的风貌,因而不宜用“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整体特征。表现之二是更多的学者对建安文学的整体特征进行了新的界定。他们认为包括建安在内的魏晋时期是一个人的觉醒时期。魏晋文学主要表现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李泽厚语),“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最值得注目的一点,是自我意识的加强。”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的社会

使命感减弱了。文学的创作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快感。(章培恒《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载《复旦学报》1987年1期)此后,许多论者对李、章二先生的论断做了引伸发挥。如果我们将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说法称之为“现实说”,那么近年来盛行的观点则可称之为“觉醒说”。“觉醒说”伴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而诞生,一反成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较之于“现实说”,“觉醒说”重视到了长期忽略的问题,凸现了许多被忽略、被曲解的问题,开启了人们的思维视野,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但是,“觉醒说”同样不能包容建安文学的整体特征。显然“觉醒说”是就整个魏晋文学的共性而言的,相对忽略了建安文学的个性。从建安诗人的创作情况看,功业思想与英雄意识是他们思想的主导,他们的创作中的确大量存在着关心民瘼、抒写壮志之作,这是不能忽视、淡化的客观事实。同时个别论者全盘肯定了魏晋时代“人的觉醒”之思潮,也是值得商榷的。将自我与社会政治完全割裂,放弃个人的社会责任,沉湎于生命本然的享乐之中,未必是一种“觉醒”。人的觉醒思潮所带来的,既有思想解放的真觉醒,亦有人格沦丧、道德堕落的假觉醒。不可一概而论。因之,如何全面准确的把握建安文学整体风貌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对建安文学成因的研究可区分为非文学原因与文学源流的演变两个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促使建安文学繁荣的社会政治原因的阐释,只满足于套用刘勰“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成说。新时期以来许多学者对建安文学进行分期研究,他们以曹操一统北方为界,前期的建安文学确与现实的动乱相关,但即使此时也还有其它原因。至于建安后期(邺下文坛)文学的繁荣,不但不宜用“世积乱离”来解释,恰恰相反,它是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的产物。不用说,文学的繁荣是多种因素的凑泊。较之于以前将建安文学繁荣的原因归结为“世积乱离”的单一解释,新时期以来不同侧面的解释

更具有合理性。

从文学流变的角度看,建安文学乃是对以往文学传统的承继与延展。大多数学者认为建安作家对文学传统的继承是较为全面的,又是有一定侧重的。有人认为建安作家最为重视的是《诗经》中的风雅和汉乐府民歌;有人认为汉乐府对建安诗人的影响更为直接;有人指出汉赋对建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尤其对五言诗的腾涌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还有人指出建安诗人从楚辞和《古诗十九首》中吸取成分。凡斯种种,均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三曹研究是建安文学研究中的热点。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受到了新中国文学界、史学界和哲学界的共同关注。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郭沫若先生为首发起了一场应该如何评价曹操的大讨论。多数学者认为从社会政治表现方面应该肯定曹操,但也有个别学者坚持了相反的看法。十年动乱中曹操被打扮成法家路线的代表。近些年来学者们重新评价曹操,对曹操的主导思想、人才观念、军事思想、神仙意识以及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注、诗歌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征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与17年不同的是:对曹操思想的探索更为广泛深入;对曹操文学创作的研究明显加强。多数学者认为曹操诗歌体现了建安时代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对一向避而不谈的游仙诗也开始重视起来了。

封建时代,曹丕通常被视为篡逆的奸贼和心胸狭窄、阴险狠毒的小人。郭沫若先生认为曹丕是“一位旧式明君的典型”;数十年来,学者们针对此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体而言,多数学者都能程度不同的重视和肯定曹丕在汉魏转捩之际的历史作用。五六十年代学界对曹丕诗歌评价偏低,认为他的诗歌反映的生活面狭窄,艺术风格流于纤弱。近年来这种偏见已得到扭转。许多论文对曹丕诗歌的内容与艺术风格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见。与对曹丕人品和诗品的评价不同,学术界对于曹丕的文论一直较为关注,评价亦

高。多数学者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位置。

近年来对曹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考辨、政治能力与政治表现、文艺思想、文学创作等四个方面。对曹植生平的考辨历来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经过学者们近年的努力,得到了一定的改观。一些长期积疑的问题得以冰释,一些长期忽略的问题引起了重视。对于曹植在政治领域内的表现,50年代有一场小范围的讨论,1983年徐公持先生著文回顾了那场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曹道衡、胡明等先生近年来亦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以前将曹植文艺思想视为保守退步的旧说不同,新时期以来多数学者认为以曹操逝世为界(亦有人认为应以曹丕得立太子为界)曹植的创作有明显的差异。在17年中,由于受政治中心主义的干扰,研究者只重视其具有政治性人民性的作品,近年来学者从审美的角度观照曹植全部诗歌,多有创新之见。针对曹植游仙诗的评价也展开了一定的争鸣,打破了昔日的冷寂。曹植的辞赋和散文创作也日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对《洛神赋》的研究,除“寄心君王”说和“感甄”说之外,又出现了象征说、原型说等新的提法。

一些学者从作家的思想到作品的主题类型、思想意蕴、意象意境、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语言色彩等不同的方面比较研究了三曹及其作品;还有一些学者将三曹与异代诗人比较研究,例如屈原与曹植、曹植与阮籍、曹植与陶渊明等。这些比较研究进一步突显了三曹在中国诗史上的位置。

新时期以来的三曹研究充分体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气氛,也出现了一些功底扎实、创见迭出的力作,整个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

在较长的时期内我们事实上冷落了建安七子和建安其他诗人。新时期以来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出现了一些搜集、考订及评述建安七子生平事迹的文章;其次,对建安七子的处世态度有了不同的看法。流行的观点认为孔融的政治态度与其他六子不同,他

与曹操有矛盾,王粲等人则依附于曹操。与此不同,或以为七子在依附曹操前后都具有共同之处;或以为孔曹交恶是性格的冲突,或以为孔曹交恶源于政治立场的对立。王粲的态度亦比刘桢等人远为复杂,不宜笼统说王粲等六子依附于曹操政权。最后,在文学创作方面,学者们析论了建安七子诗、文、赋的主题类型与艺术特征以及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总论七子的共同特征,或分论七子的不同特色,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新见解。

五六十年代,就蔡琰及其《胡笳十八拍》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近年来亦有人提出了新的看法。同时,对杨修、丁翼、丁仪、吴质、繁钦、应璩、甄后、左延年等建安作家亦有所论述。较之于建安七子和其他诗人在建安文坛的地位,我们的研究还很不相称。

文人集团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邺下文人集团虽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文人集团,但它以其崭新的面貌、独特的风采而饮誉诗史。近年来一些学者围绕邺下文人集团的人员组成、组织方式、活动内容以及对后世文人集团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考论,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或以为三曹与邺下文士之间是平等友好的新型关系,曹丕、曹植兄弟与邺下文人之间具有诚挚的友情。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其活动方式、内容为后世文学集团做出了榜样;或以为三曹与诸子的关系是主子与文学侍臣的关系,邺下诗人的创作既有激越昂扬奋发向上的一面,又有徘徊消沉的一面。后者显露出来的消极趋势是不容忽视的;或以为邺下文坛是噩梦之乡而不是所谓的作家乐园。沦为“做诗相公”的邺下诸子,他们的人格和自尊已经深深地受到了摧残。关于邺下文人集团的研究,虽然文章不多,却可以看到针锋相对的观点。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评价邺下文人集团是一个尚待深入研讨的课题。

文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昭示我们:一代诗风的研究应当着眼于“两线一点”。一线是指作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背景以及由以上诸因素综合而形成的时代士风,这是一条横线;另

一线是文学史自身发生、发展、歧变的过程,这是一条纵线。纵横两线交差的“点”便是我们所要重点研究的创作主体及其文本。只有将“两线一点”的研究结合起来,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透视,才可能探明时代诗风的深层意蕴和整体风貌,更为准确地把握时代诗歌的审美真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当采用不同的方法。传统的方法与现代的方法、文史哲结合的方法、义理辞章考据的方法、心理分析与结构主义的方法……无不可用,唯一的前提应当是从文学史的原始材料出发,让操作方法服务于文学史研究,而不能让文学史去服务于某种方法或理论。

在建安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对“点”的研究倾注的力量最多,取得的成果最丰。迄今为止,我们对作家生平的考证、对作品系年的考辨、对作家思想和人格的研究、对作品中情与志、意象与意境、艺术手法与艺术风格的研究等已有了相当的深度与广度。种种研究专著、文集、论文即其明证。但我们不能说建安文学历史的真相已经毕现无遗。恰恰相反,在建安文学研究领域内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可做。建安与盛唐同为诗史上可以并峙的两座高峰,较之于盛唐文学的研究,建安文学研究还很不够。不要说许多二三流的诗人,即使是三曹这样的大家,研究也不够充分。较之于曹操和曹植,对曹丕诗歌的研究颇显冷清。通常人们把曹操看作旧时代的结束者,把曹植看作新时代的开启者,忽视了曹丕在诗史上的巨大作用。就曹操和曹植研究而言,我们过多地关注于他们的诗歌,而对曹操的散文、文艺思想、对曹植的散文和辞赋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就三曹诗歌研究而言,可以说,如何定位三曹在中国诗史之位置的问题还远未解决。

以往的研究较少从纵横两条“线”上去考察,而建安文学的繁荣既与建安时代的政治情势、文化氛围、社会生活、哲学思潮、士人心态等因素息息相关,亦与中国诗史的嬗变密不可分。从文化大背景与从诗史大系统中透视建安文学是深化建安文学研究的重要途

径。在那里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供我们开掘。

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为建安文学研究提供了范例和经验。无庸讳言,其中亦有失败的教训。事实说明套用所谓的新方法来肢解建安文学,难免有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之弊。如何应用具有创造性与广容性的优化方法去深入研究建安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是横亘在每一位文学史研究者面前的难题。

二、本书的内容、结构与两点说明

基于上述理解,本人近年来的建安文学研究着眼于纵横两条线。1993年6月提交的由霍师松林先生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探究了汉末桓灵二世士风类型之后,析论了建安士风对桓灵二世之士风的承仍与拓展。继而,重新审视了建安诗风的基本特征。1995年5月提交的由陈师贻先生指导的博士后工作报告《三曹与中国诗史》,意在前文的基础上,从中国诗史流变的大势中考察三曹诗歌的艺术精神、创作体制、创作方法的继承性与革新性,进而对三曹在中国诗史上的位置进行新的界定。

呈献于诸君面前的这本《三曹与中国诗史》的主体部分由内篇、外篇和杂篇三大板块构成。内篇三章为总论部分,从宏观角度探析三曹诗歌及建安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位置与作用,总论建安诗歌之整体特征。第一章《中国诗史流变大势》,用较长的篇幅析论了中国诗史流变的大势,本文认为中国诗史呈现出“三源一流”的走向,《诗》、《庄》、《骚》所代表的儒家诗学、道家诗学、楚骚诗学是中国诗歌的三大源头。建安迄近代中国是诗史的“一流”时代。三曹恰恰处于三源归一流之关捩处,他们的诗歌创作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开辟了中国诗史的新航向。第二章《建安气象》,文章认为“建安风骨”不足以概括建安诗歌的整体风貌,与盛唐诗歌

一样,建安诗歌形成了一种“大成合乐,八音繁会”的“时代气象”。贯通整个中国诗史来看,唯有建安与盛唐两个时代的诗歌形成了“时代气象”。第三章《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从本世纪初叶,建安时代即被论者视为“文的自觉”时代,80年代又加上了“人的觉醒”时代,此说达到了众口一词、雷同一响的地步。本文回溯了“自觉”说滥觞、嬗变的过程,予以述评检讨,并提出一己之见。外篇第六章为分论部分,本部分采用散点透视法,就三曹与中国诗史相关的六大问题做了具体的析论。第四章《曹操的主导思想》,在剖析了曹操的思想行为之后,本文认为曹操是一位逆违儒家经学的叛逆者,但其思想之主导方面却与原始儒学人文精神有诸多扣合之处。第五章《曹操对原始儒学的诗化》,就曹操诗歌中所体现出的原始儒学人文精神及诗学观念加以探讨,文章认为曹操诗歌从实践上落实了原始儒学“诗言志”的诗学理想。第六章《曹丕诗歌的生命意识》,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强烈感受是魏晋时代生命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帜之一,曹丕诗歌深刻表现了他对生命真谛的思索与体悟,诗人在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中开掘生命的深层结构,显现出生命个体不懈追求的全过程。第七章《典论·论文》甄微》,文章首先考证了《典论·论文》的撰写年代,认定《典论·论文》撰就于建安十六年前后;否定了《典论·论文》是突破儒家传统文艺观之“号角”的成说;并认为曹丕撰写此文的初衷一是为了促进邺下文士的团结,二是为了劝慰邺下文士安心于翰墨工作。第八章《对曹植人格建构的动态考察》,从中国古代士、诗人之文化心理流考察,儒道互补是古代士、诗人人格结构的基本模式,中古大诗人曹植则是这一人格模式的完成者。第九章《曹植诗歌的情感特征》,本文认为曹植诗歌构成了“哀而且怨→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特征。这一情感模式在中国古代诗史上具有普遍意义与典型意义。杂篇三章为外围部分,是内、外篇所涉及而不便展开的思想史与诗歌史问题,此三大问题分别涉及了中国士人思想观念、诗史流变及诗人人

格境界等问题。第十章《原始儒学的真谛与歧变》，就原始儒学之真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原始儒学之核心是“修己以安百姓”，以道统自居的宋明儒师与现代新儒家皆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第十一章《庄子哲学中的三重人格境界》，认为庄子人格有真人人格、隐士人格和士大夫人格三重境界，学界对庄子的歧见主要源于对其不同人格境界的漠视与混淆。第十二章《庄子与中国诗史之源》，认为《庄子》可与《诗经》、《楚辞》鼎足而立，同为中国诗史三大源头。

一般而言，为了反映研究对象之全貌，学术论著的部分章节不得不沿用成说、重复旧见，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云：“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为了避免“势自不可异”的弊端，本文采取了专题论文的写作方式，不求面面俱到，只选择了若干自己有感想、有新见的问题分别展开论述。这样，本书合之虽为专著，分之则为论文集。此种方式的优点是每一章即为一篇首尾完整的独立论文，便于突显自己的见解，其缺失是因为不是一气呵成，每篇文章各有侧重点，是故论文与论文（章与章）之间会有重复甚至抵牾之痕。为了照顾每篇论文的独立性，作者在后期修改中没有强行斫削，以求弥合。另外，本书与《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同为作者近几年研究建安文学的论文，二文在材料取舍、观点、视角方面有一些不可避免的重合，为了区别，作者在本书中力求突出一己之见，并争取能在整体水平上较前文有所提高与深入。是否实现了这一意愿，尚待读者明察。谨此说明。

内 篇

第一章 中国诗史流变大势

一、问题的导出

欲准确地界定时代诗人在二千年诗史上的地位,首先需要从宏观上把握中国诗史流变大势。不论是否承认,不论是否自觉,对中国诗史分期的看法是每一位文学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本世纪以来它已成为文学史论家所关注的主要课题之一。今日流行这样一种模式:依据历史朝代的变迁,将文学史划分成不同的段落。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这是一种僵化的模式,并不契合诗史自身流变的规律,不能揭示诗史内在本质。于是,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就有一些学者尝试按照诗歌嬗变的内在规律进行新的归纳。这样的探索百年来持续未断,近年来尤为突显。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歧义性和艰巨性。在众多的有关诗歌史的宏观透视之中,闻一多先生的见解格外引人注目。闻一多先生首先将中国文学发展史划分为古代、近代两个阶段。古代起于周成王时止于汉建安五年(前 1063—200 年),历时约 1300 年;然后又将近代分为前、后二期,前期为建安五年至唐天宝十四年(公元 200—755 年),